



南塘

南塘没让他等到天热,但他也没马上就给他看颜色,如果那样南塘就不是南塘了。一出了正月,天一天比一天暖和,先是脾气暴躁的寒风和气了下来,哼哼呀呀像小孩子那样唱起了儿歌,也不再狂手狂脚随时都要把你挠你一把;底下柳树就第一天绿了头冠,第二天就撒出阴影;被冬夭折磨得差点儿枯萎死掉的麦苗全站了起来,纷纷吐出能漫进人肚子的浓密新绿,又待了几夜,就开始了咔咔吧吧拔节;燕子飞来了,蝴蝶飞来了,绵绵无尽的春雨也跟着加劲儿来了……

那半月雨就没有住过,紧一阵慢一阵,漓漓拉拉,村街上被人和家畜的脚搅出的泥深及腿肚子(村街成了一条泥河),从村子通往南塘的那条路堆满烂泥。在连阴雨的时节,村子里布满烂泥与牲畜粪便,树和房屋拦住了天光,到处污秽阴暗;田野里却开阔而清爽,经了雨水洗浴,庄稼葱翠疏树苍绿,空气洁净而清新。身子滚烫的土窑被雨水浇淋着,丝丝缕缕冒出好长的白汽,像长满一身的白毛。天越来越长,夜就越来越短,再者还有“春眠不觉晓”,楼蜂的活动受限很大,他上村子里去取一件鸡不但要被满地烂泥垫得脚脖子酸痛,而且没回到窑上眼皮就打架,被瞌睡折磨得死去活来,所以对有些在树枝上安卧的鸡来说淋雨确实是一种幸运。楼蜂要隔上三两天才进村一次,不到肉瘾发作无法忍耐,他是不会轻易出动的。

楼蜂也很少摸黑打毛衣,他好几次刚织了几针就坐在床上进入梦乡。出事的那天南塘里的蛤蟆咯咯哇大叫了一整天,像是被一盘拧紧的发条折磨着,一刻也没停歇。那天楼蜂和项雨半后响已经去了南塘,而平时不等到太阳落巢根本见不着他们的影子。两个人和另外两个白天值班的人钻在窑洞里打了好几圈“升级”(扑克牌的一种玩法),直到看不见扑克一角趴伏着的小小数字时才算罢手。牌终人散之后,楼蜂又回到他的小土屋织了大半团毛线的毛活。他给自己制订的一天的任务完成了,就早早地把毛活兜子放好了地方。这天晚上他没准备去村子里取鸡。他走出土屋,打算放放身体里的废水就上床。雨一整天都丝丝缕缕的,雨点儿细得洒到头上都能被头发梢亮晃晃挂住,可这会儿突然大了,砸在杨树叶上、南塘里的水面上,哗哗哗地响。楼蜂站在门外的雨地里,马上意识到不该走出门口,站在门槛里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既来之则安之,他就呼呼啦啦和雨水比赛着往水洼里倾注。他裤腰带没系好,漫不经心朝土窑看了一眼,像被火燎着似的,猛地大叫:“项雨项雨……”接着他没有再进土屋,而是折身向项雨待着的窑洞里冲去。

楼蜂又一次看到了无头鬼!要是这老兄和平时一样,仅仅是断个脖子伸个手,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它离楼蜂还有一段相当安全的距离,大胆的楼蜂根本就不可能把它当回事儿的。可这一次无头鬼变了模样:他坐在窑洞上的窑体半腰,身子陡然膨大了10倍,光是脖子的断茬也有窑顶上的窑口那么粗。这一天是朔日,黑暗深沉又结实,像是一块块大石头严丝合缝垒砌而成,在这样的黑夜里,无头鬼浑身散发的蓝荧光就更显得昭明,绚烂夺目又惊心动魄。楼蜂是愣了一刻后发出的那声能撕裂人肺腑的大叫,似乎不是他自己冲进窑洞的,而是无头鬼的两条炫目的胳膊缓缓地抬起,向他伸来,接着轻轻一拢,他就像一只被老鹰翅膀围赶的鸡一样朝着窑门口狂奔。在楼蜂钻进窑洞的刹那,轰隆一声,窑体坍塌了,那处砖砌的拱洞被灼热的窑土埋没、压实,就像从来也没有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们发现窑体坍塌是在第二天早晨,来接班烧窑的人怎么也找不见应该很好找的那个拱洞了。雨水的大手拍实了松土又顺坡冲荡出无数的沟沟壑壑,看不出来一点坍塌的痕迹。两个披块塑料薄膜当雨衣的人围着光秃秃的大坟一般的土窑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才确信是窑塌方了——“楼蜂项雨这两个家伙呢?”两个大人眼瞪小眼,钻进钻出小土屋了好几回,里里外外寻找,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跑回村子,去楼蜂项雨家里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他们不可能再找着神出鬼没的两个胆子比天还大一些的小伙子了。

半拉村子里的大人孩子踏着烂泥,几乎一个不漏地全聚在了南塘上。还好,半夜里雨已经住了,这会儿雾气消散,一切都显得清清爽爽,等到人们一点一点扒开仍然灼热的窑土,小心翼翼地找到项雨楼蜂,那轮半个多月来就没有露过一次脸的太阳,已经像一枚会自己滚动的鸟蛋,在东天一排真草般的乌云上滴溜溜地旋转腾跃。

这窑砖已经开火五天,要不是出事,马上就截火了,所以整个窑上上下下都被旺火烧

长篇小说

《夜长梦多》(节选)

□赵兰振

内容简介:

嘘水村是豫东平原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了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在村南的田野里开挖了一口池塘,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先是一位外号叫水拖车的游手好闲村民在池塘里捕到了一条大红鲤鱼,之后村子里的干部老鹰正午时刻在塘埂上撞见了一个裸露脖颈断肢的无头鬼。这个无头鬼还协同夜半时分悠然飘出的绿灯笼骚扰在池塘边烧窑做砖的人们,并最终让两个年轻人死于非命。一个女子的笑容彻夜回荡在寂静的村街上,这女子甚至白天也坐在砖窑的顶端俯瞰众生……

与南塘多彩的历史同时上演的是村庄的故事,一个叫翅膀的孩子顶替父亲在塘边值夜,看护捕获上岸等待分配的鱼堆,他竟然鬼使神差地抱着那条传说中的大红鲤鱼睡熟。这孩子被他的亲戚正义当成了朝上爬的梯子,他胸前挂着“社会主义淡水鱼强奸犯”的纸牌游街示众。无人知道孩子的深刻疼痛,无人能够理解这羞辱将如何影响孩子的一生,让他长大成人多少年后回到故乡仍然痛不欲生。好在头顶三尺有神灵,当孩子被扭送公社派出所时,军人出身的所长坚决地否定了人们的臆断为孩子松绑,救下了孩子。而这孩子之所以抱鱼而眠,是因为他当夜刚看了一场百年不遇才在村子里放映的电影

《追鱼》,还因为朦胧中萌动的柔情——不是爱情,而是生命对美的渴望。翅膀喜欢那个叫何云燕的女孩,把何云燕幻想成了云里雾里的仙女。最美的事物总是最脆弱的,不堪一击。当成年的翅膀再度回到故乡,远远看到他曾经的偶像当街与人吵架,竟然抛出身体隐秘部位的月事纸巾当武器反击对方时,他的心碎了,一下子感觉世界全成了废墟,一派虚无。

命里只有三合米,等到老死不满升。正义并没有如愿以偿,哪怕机关算尽,他的命运不可改变,仍然老老实实地固守在嘘水村子里生儿育女。他患了严重的手病,经年不愈,正当绝望之时村里来了位神医王老师,她能以人生的两种状态存在,有人看她是老太婆,有人看她则是年轻姑娘。王老师告诉正义治疗的方法,并且揭开了南塘的谜底:南塘是女娲居住过的地方,因为人们挖塘掘开了这故居,此处固定着的永恒的女神被迫进入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周期,有生也有死。正像王老师预言的那样,嘘水村连年的干旱最终使南塘干涸,并夷为平地。南塘消失了,那个热闹的时代也一同永远消匿。

这其实是一颗心灵和一个群体的变迁共同构建的历史真相,千变万化的南塘仅仅是这真相中的一个奇特符号而已。

这也是一个有关宿命的故事。

透;烧透的土覆裹着楼蜂项雨,比两个人对付鸡的炉膛热得更加深厚久远劲道十足。人们用棉手套蘸饱水,拨拉出土堆里的两个人时,两个人的身子已不能用手碰,一碰肉就从骨头上剥落,就像烟过头了的烧鸡。最后晾晾热气,用被子贴地裹着,才算把骨肉早已分离的烧熟了的两个人收在了一块门板上抬走。

这座兴隆了将近半年的土窑从此偃旗息鼓,嘘水村的人此后无论穷到什么份儿上,也决不会再打烧窑致富的主意了。多少年后那座窑仍那么孤零零地站立着,站在旷野之上,南塘身边,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像是在诉说着什么。人们听任风雨一点点剥蚀它,谁也不再去动它一个指头,甚至连窑里的那些砖块,也从没人去动过。后来有一天——这时候已是10年之后——村里整修街道,不知谁想到了这窑砖,于是赶集一样去了许多人,才敢将这窑封存了多少年的砖块搬出来。但那些落伍的砖块确实只能垫垫脚铺铺路了,它们做不成爬屋上墙的高攀美梦了,岁月早已把它们玩弄得半拉半拉,浮头的好些层面风化成了一堆红末末。即使半拉半拉,或是风化成了一堆碎末末,那股燎烧鸡毛的气息仍然萦绕不散。那股气息浸透了那些久经考验的革命红土,已经成了它的血,它的肉,它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搬出这窑残砖时,人们发现窑里缝缝隙隙塞满白色的蛇蜕,就像出土的古代的白布作坊。人们断定这座土窑已经成了蛇窝,从那些比棉裤腿还要宽胖的蛇蜕推测,这还是窑大蛇,大得甚至超出想象。当时是暮春,是蛇们最活跃的时节,搬砖的人提着心吊着胆,一边干活一边做着随时逃跑的准备。但是直到窑肚子被疑惑感地清空,人们也没有见着哪怕是一条手指头那么粗筷子那么长的小蛇。

王老师

王老师无愧于“老师”这个称号,她不但会看病,还会算命,还精通堪舆之术。最让嘘水村人信服的是她竟然算出了项风的大哥项雨30年前死于一场“火水之灾”,还测出有“一只胳膊”在托举着正义家的宅子,而且还说宅主自己清楚这只胳膊的来历。不但正义清楚,嘘水村的人没有不清楚这条胳膊来历的,他们都听说过正义家淘金并淘到了一条大棟树根,不用讲也都明白那是哪一棵棟树的树根。当王老师坐在那张软床上轻描淡写说这些话时,挤挤挨挨在正义家堂屋里的人大气也不敢出。他们又一次觉得自己眼睛看的压根儿和自己是两码事,眼前的这个有点放肆又有点老成持重的老太婆或者说姑娘分明是真正的但又不太像是真的。他们又一次疑惑感。不再疑惑感的是正义,当院子里哄哄乱时,正义没有露面,他躲在自己独居的那间西旁房里闭门不出。正义有点心惊胆战,他甩着自己的两只病手,恨死了坐在堂屋里的这个神魔鬼道看穿他底细的老太婆,可他又有点怕她,不敢真恨她。世上没有什么比想恨又不敢恨这种事更折磨人,正义明明恨得牙根儿发痒,却又强迫自己认为那不是源于仇恨而是发自刚刚入口正在品尝的美味。饱受这种痛苦折磨的不惟正义一人,嘘水村那些平素人五人六的人,一俟坐在王老师的面前,马上品尝到了“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的滋味。在这些被王老师洞穿内里的败絮者当中,有一位是水拖车的遗孀,也就是翅膀的后母。

此时水拖车已经作古多年,他携带着他的关节炎、对他鱼类莫可名状的痴爱没入土地。但关节炎不是夺去水拖车在人世生存权的元凶,元凶是伴随关节炎而来的风湿性心脏病。据镇医院的医生说,水拖车患的是一种叫“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心脏病,“要是想多活几年,那就去北京换瓣膜吧,那玩意儿是钛合金的,美国进口,换一个至少也得3万元人民币!”那是个年轻医生,他向

现的。正义浑身舒泰。

水拖车过世的时候翅膀奶奶做主没让通知翅膀。她不想让孙子千里迢迢跑回来奔丧,“怕耽误他念书”,也不愿他用拮据的手头抚摸遥远的行程;再者翅膀奶奶坚持认为水拖车不配“父亲”这个名号,翅膀理所当然不给他送葬。为了节省开支,翅膀上了两年大学没有回家一趟(既使享受半价优惠,他回家的单程火车票价仍高达12.5元;而从通铁路的省城到距离嘘水村最近的镇上还要转两次汽车,票价加一起为5.7元)。当时翅膀每个月能领到15元钱的助学金,吃喝用度消耗掉一半,他把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另一半寄给奶奶。翅膀单纯的大脑从没想过他的奶奶不识字,不认识只写着父亲大名的汇款单(奶奶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翅膀只能在父亲的姓名后头缀上“交奶奶”三个字,他当时想即使他不缀上这三个字父亲也应该明白他的意思),奶奶那双裹过的小脚也不可能挪到八里外的镇邮所取回他省吃俭用积少成多的现金,这些钱理所当然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水拖车媳妇的腰包。当第二次收到汇款单时,水拖车媳妇已经摸准了日头,她会在特定的某几天里踅摸在村口静候乡邮员的到来。翅膀在那个陌生的城市不舍得坐一趟5分钱一张票的公共汽车,走累了、渴得不行也舍不得喝2分钱一杯的白开水,份儿高得一毛五的菜肴他从不问津;他只是每天准时去一趟邮局,把带去的一本书一页页揭开,唤出分头夹藏在书页间的一张张零碎钞票。直到奶奶过世,翅膀才终于停止他坚持了两年的这个习惯。大学校园历来充斥着歌声与青春,是滋生爱情的肥沃温床,但翅膀不再会染指爱情了,“爱情”这两个字是他的一大忌讳,他的青春在他还没来及挨到青春期的时候已经被先期降临的深刻疼痛埋葬。王老师说,“你当了两年‘三只手’,你偷了不该你花的钱。那可不是一般的钱,那是孝敬钱,只有被孝敬的人才能动它。所以你注定腿痛,所有的偷都会跑得飞快,对小偷的最合适的惩罚就是让他的腿生毛病——你得的是腿病吧?”刘大姐平素时不时地还要耳聋一下,当听到不想听的话语时她总是装作听不见,故意跟人打岔,可这时她支棱着耳朵,没有漏掉王老师说出的每一个字。她开始噤声不语,开始竭力扩展两泡肥大的眼袋托举着的粘结有一星半点白色眼屎的松松垮垮的眼睑。她艰难地嚅动嘴唇,好一会儿才怯生生地憋出几个字:“这么说我都知道了?”王老师目光烁烁盯紧她,没有认可也没有否定。“欠账还钱!”王老师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要想轻轻松松走路,那就多多还债吧,多多给你欠债的人送钱花。”

“清官难断家务事”,截流翅膀孝敬奶奶的汇款的秘密深藏在一个人的肚子里,从来没有孵化成哪怕是低微的声音震动过空气,甚至水拖车本人的耳膜也从未为这个秘密引发出的声波颤抖过一次。水拖车媳妇(姓刘,按照嘘水村的规矩,我们称她“刘大姐”吧)为此得意过好一阵,这笔意外的小财让她沾沾自喜,好几次她都独自笑出了声。直到坐在王老师面前,王老师突然提及此事,她才大吃一惊,才明白什么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桩隐藏得极深的家务事到了此时才算有了明确的结断。

刘大姐现在已经老得用三条腿走路,站在她家的土院外头,经常能听见咯咯咯有节奏的缓慢声响——那是她在小院里来来回回活动腿脚;她患有老年性关节炎,医生告诉她膝盖不肿的时候要堅持锻炼,否则两条腿就有可能变成她手里的拐杖那样的直棍,再也不能折弯。她的小院里非常寂静,除了她手里拐杖不连续的磕地声外很少有其他响动。刘大姐和坟墓还隔着一段距离,但已经体会到坟墓里深刻的寂寞滋味。水拖车刚开她独自走了,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而且转眼就像她当年初来嘘水村时那样——她们都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女儿们的家境并不殷实,得益于她多年的熏陶,家风也不厚道,所以她只能回到嘘水村的这个破落小院,而不能把女儿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住。刘大姐认定她的关节炎来源于丈夫(其实关节炎并不传染),每当腿痛难忍,她就骂不绝口,将水拖车前八百年身世全都咒遍,接着又怨自己年轻无知一时眼瞎,踏进嘘水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据刘大姐后来说,那天她从床上爬起来刚洗

《夜长梦多》的写作始于1998年秋天,当时我刚来北京,住在景山后头一座堪称雄伟的大楼里——那座楼属俄式风格,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味道,看着富丽堂皇但其实只是一座办公楼改成的筒子楼,去一趟厕所要疾步快行数百米,两旁挂着帘子的或闭或张的门列队监视着你。我住在五楼(顶楼)一处只有7平米的用垃圾间改造成的空间里——是的,我不知该如何称呼它,因为那并不是一间房,而仅仅是一处呈“L”型的盲道,像是手枪的形状。当躺在床上睡觉时,我想象自己是一粒枪膛里蕴足了劲儿的子弹,要是某一处神秘的机关扣响,我会飞射出去,朝着故土的方向一路飞往昏梦的梦乡。

当然,飞翔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想象。我每天清晨5点起床,拾级而下,出门绕着尚在睡梦中的景山公园一周,回到那处狗窝一般的住处,趴在木板搭起的书桌上让笔尖与白纸亲吻,发出滋滋的不停歇的诱人声响。我想写一部中篇小说,写写我生活过的村庄,村庄田野里的那一泓清澈的池塘,写写围绕这口叫做“南塘”的池塘所发生的一切……语言照亮记忆,记忆的纷繁密集成令我吃惊,小到一株庄稼一只昆虫,大到一个季节一座房屋,事物犹如洪水,犹如漫天的星辰,朝我涌来,覆盖了我。想象裹挟着我凌空而起,我只有顺应着语言的意志写下去,但肯定已不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

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语言,只有想象,不可能再有一丝多余的干扰。我白天去一家出版机构上班,仰人鼻息,拿到手略带羞辱性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作为我逃离的自圆其说的理由——之前我一直在故乡的一家乡镇卫生院上班,安安稳稳地做一名骨科医生,而且小有名气,算是那一方土地上的“名医”。天天求医者盈门,让我不曾拥有过一天不被扰乱的时光。有一天晚上我去镇外的田野散步,突然听到镇上的高音喇叭在喊我的名字,吓了我一大跳,侧耳细听才明白是有病人找我看病,喊我快回。我不想如此热闹,也不想被盛名之下的责任重担压死。我想逃开,想拥有吃一回安生饭睡一场囫囵觉的生活,想静静地读读书写我喜欢的文字。于是阴差阳错,我就钻进了北京城里的这管枪膛之居里。

写作伊始极顺利,我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天天意犹未尽。我沉浸其中,有说不完的话。对着白纸倾诉是我那一个时期的生活主体。但好景不长,接着我就搬离了那处枪膛,不再是一枚子弹,而成了一个为谋生而奔波在北京街头的匆忙男人。我住进了更宽敞的房子,但不再拥

创作谈

想象生活

□赵兰振

有美好的孤独时光。因为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决计不再回返,不再重新让听诊器圈住脖颈,全家人都只能随我北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家人的生计绝非小事,我只有放弃一切,拼命做事挣钱,好让家里的米缸常满,尽顶梁柱之重任。我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不想着我的小说,但却很少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写作了。再说要走进我的小说世界也不那么容易,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深深的孤独长廊,那个世界不可能打开它的大门。

但其实这些生计之虞仍然是借口,让我举步不前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对小说的审视。我在重新认识小说,试图通过写作这部作品来探索小说深藏的奥秘,从语言,从叙述,从艺术真实乃至思想性……从各个层面抵达小说的内部。我借助不懈的阅读,借助反复的思考和琢磨,一点一点地在解开纠结,解开小说之谜。但对小说的考量越多,写作进展越艰难迟缓,有点像在缺氧的高原上攀登山峰,到了一定高度想再往前进一厘米都困难重重。总是眼高手低,这一次你觉得已经通过了某处隘口,解决了某个难题,你肯定能够写出另一种面貌的文字,抵达理想的高地,让自己激动不已;但事实总是在唱反调,折腾来折腾去,你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你察觉得出毛病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仍然顽固地站在那儿,阻挡着你前行。

生活在悄悄出现转机,终于有一天我不再被谋生之事困扰,我可以坦然将精力投入到小说写作中去了。这时候似乎我也解决了写作的诸多难题,能够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字了。我开始着手完成这部延续经年的小说。我磕磕绊绊,没有再毁掉写好的文字,而是将片段连缀一体,算作漫长劳役的终结。

集体的历史和个体心灵的历史压根儿就是两码事,是两个面貌迥异的世界。但历史只关注社会事实,从来不去探究心灵风景,恰恰是个体心灵的微妙变幻在决定社会历史的走向。在《夜长梦多》里,我试图写出一个村庄的历史和一个人的心灵历史,让两者共同构建历史真相。但我明白这种努力也是徒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不可能以蠡测海,繁盛茂密的真相是永远无法穷尽的。

一件经过锻打的铁器,早已褪去烫红,早已成为沉甸甸的黑冰,让该使用它的人使用它,该拥有它的人拥有它。现在我只想扔开它,彻底忘掉它,就像狮子用牙齿撵走成年的孩子。写作的兴奋与沮丧皆成往昔,我已经厌倦,不想再多提这场苦役一个字。